清宫旧藏佛衣考

马云华

内容提要　乾隆时期清宫佛衣的制作曾盛极一时。本文以故宫博物院现藏实物和造办处档案为第一手资料，从分类、制作、工艺、样式及风格特征等方面对清宫佛衣加以梳理，力求呈现乾隆时期兼容传统佛衣披着规制和宫廷审美理念的清宫佛衣之全貌，以揭示清代宫廷佛衣的整体特征。

关键词　清宫佛衣　乾隆时期　样式　造办处　苏州织造　艺术特征

佛衣泛指诸佛所披着之衣，既是佛教造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可单独作为一种特殊的礼佛敬佛法器，用以表达崇敬尊神、祈佑众生、彰示大吉祥之寓意。根据仪轨，佛教诸神因身份不同所着佛衣的形式亦各不相同，并以此体现不同尊神的神性特征。佛衣样式也是体现佛教造像风格特征的重要元素之一，是考察和把握造像风格、造像年代、传播轨迹和地域分布等的重要元素。

佛衣从印度传入中国，历经上千年的演化，所形成的种类、形制、披着方式及宗教含义极其丰富。由于佛衣实物和文献的缺乏，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通常更专注于造像本身，而对其衣着的考察则未给予足够重视，所以迄今与佛衣相关的论著少之又少。

本文讨论的“佛衣”一词，借用了清宫档案中的称谓，特指故宫博物院保存的旧藏清宫佛衣。由于乾隆皇帝的极力推崇，清代藏传佛教达到了空前兴盛，兴建了大量佛教寺院和佛堂，由此也产生了对佛衣的巨大需求。佛衣不仅是当时的佛堂重器，还成为皇家御赐、封赏和加强民族交流的特殊政治工具。本文从故宫博物院现存实物入手，结合档案，对清宫佛衣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和考证。

一　故宫博物院现存佛衣实例

佛衣是故宫博物院宗教类藏品中一个特殊的门类，保存数量相对较多，尤以乾隆时期的制作和遗存为最。这些佛衣华丽考究、工艺精湛、样式各异，在宗教类藏品中格外引人注目。清宫档案中的佛衣之含义极泛，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佛教尊神造像穿戴的佛衣，二是用于佛堂供奉的佛衣，三是专供宫廷僧人穿用的仪轨用衣。三者因其功能和适用范围不同，在制作工艺、用材、装饰、制作成本以及艺术效果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方便读者了解清宫旧藏佛衣全貌，本文结合故宫博物院所藏实物，着重对档案记载的前两种佛衣进行探讨，并将其分为袈裟、菩萨衣饰、本尊及忿怒尊神衣饰、仪轨用衣四大类，分别阐释不同供奉方式下各类佛衣的不同特征。

〔图一〕长方形片金佛衣



（一）袈裟

袈裟主要指诸佛造像所着衣饰，大致分为两种，一种为多层牙子包裹式袈裟，另一种为田字汉式袈裟。

多层牙子包裹式袈裟是清宫佛堂中最常见、最典型的一种佛衣形式，现存数量最多。此类袈裟展开后呈长方形、半圆形或梯形，分正反两面，正面多为黄素绸缎，多在正面横向一侧边缘镶多道牙子，牙子数量不等，少则三道，多则八道，牙子常见由红、黄、绿、石青洋锦多色配做，数条叠压，披着时有牙子的一侧朝外朝上，从佛像背后披围至胸前相交，呈左或右衽大襟式，其余衣边掖压于佛像底座，将整个佛像包裹严实，只外露佛像头部。

〔图一〕为一件包裹释迦牟尼佛像的片金佛衣，长方形，黄色绸缎地上织片金八宝如意云纹，四周缘红色织金缎宽边，横向一侧宽边外再镶蓝、黄、红、绿四条牙子。红色宽边上以米珠缉成等距十字交杵图案，各交杵间隔处用丝线平绣蓝色彩云纹。黄色片金衣心和红色织金缎衣边，以及密集精巧的米珠相互衬托，富丽堂皇，简约明快。

〔图二〕为半圆形片金小佛衣，制作于乾隆时期。其主体部分以织片金条编织缝制而成，通体分布由极小珊瑚珠、小米珠缉成

〔图二〕半圆形片金佛衣



的梵文咒语，中间平行分布的是五字或四字兰札体梵文咒。蓝色织片勾莲纹宽衣边，半圆一边饰以米珠和珊瑚珠缉成的密集梵文咒字。小佛衣上系一个完整白签，墨书：“佛衣一件，旧存珠源寺，原册二页

五行。”说明此件小佛衣原收藏于承德避暑山庄珠源寺。珠源寺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曾是山庄内一处重要的藏传佛教寺庙，今已不存，此佛衣是其遗存的唯一法物[1]。

〔图三〕是一尊无量寿佛像所披黄色织金缎佛衣，衣边处镶蓝、黄、红、绿四色锦牙子，共八条。佛像是六世班禅进京朝觐时进献给乾隆皇帝的，佛衣乃宫中后期配做。当时一同进献的佛像还有数尊，宫中均配做了相同的黄织金缎佛衣，这些佛像及佛衣如今依然供奉在紫禁城东北隅的佛堂里。

这种包裹式佛衣做工简洁，穿脱方便，宫廷使用较多，除了释迦等佛像外，同样也见于菩萨、度母等尊神穿用。有些像的底座下还会配一块黄缎面棉座垫，大小依底座尺寸而定，与佛衣边缝缀于一起，使整个造像完全包裹于佛衣和佛垫内，即增强了造像的稳定性，也可防止佛衣松动起皱或脱落，达到整齐美观的展示效果。如〔图四〕这种绿度母像，一组共180尊，大小相同，全部用黄素缎佛衣和佛垫包裹，只露出度母头部，为清晚期成造的作品。

田字袈裟目前仅见用于释迦牟尼佛像，为量身定做，工艺繁复精美，实例如〔图五〕。这类袈裟一般是在穿好后用丝线在隐蔽处将衣边缝系在一起，使佛衣紧紧裹住佛像身体，无法掀起或轻意打开，虽然配有钮扣，但只起到装饰作用。这件旃檀佛佛衣从里到外分为三层，除了最外层的披风，中裙和大裙都用针线将衣边贴身缝死，仅露出头和手脚。因包裹过于严实，从外观无法观察到佛像身体的具体细节。

故宫博物院现存最大、做工最复杂的佛衣，是这尊铜镀金释迦牟尼佛造像所着田字袈裟〔图六〕，该佛像是紫禁城佛堂中最大的一尊造像，通高210厘米，一面二臂，螺发高髻，方面大耳，神态安详，是一尊汉地明代佛像。佛衣为乾隆时期所配，从外观看做工十分复杂。佛像内着圆领口僧衣，外着石青边金银缎佛衣，双肩前胸披褡裢式口袋。高大宽松的佛衣外面并无其他装饰，但据《陈设档》记载，此像原来有着华丽的装

〔图三〕黄织金缎包裹式佛衣



〔图四〕黄素缎包裹式佛衣



‹1› 张琼主编《清代宫廷服饰》，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46页。

〔图五〕片金田字袈裟



〔图六〕金银缎田字袈裟



〔图七〕片金斗篷



〔图八〕长坎肩式佛衣



饰：“海龙边黄片金斗篷一件，海龙边黄片金坎肩一件，银镀金钮二个。海龙边黄妆缎裙一条，随银镀金带环二件，每件上嵌珊瑚、松石、催生石七块；银镀金结子二件，每件上嵌松石四块；石青边金银缎佛衣一件，项上挂。石青边洋花缎佛衣一件，镀金银钮二个。石青边黄妆缎裙一条，项上挂。至清末佛衣上这些华丽的珠宝饰物已残破不全。”[1]

此外，此处需要提及的斗篷，是一种特殊的佛衣形式，造像中仅见释迦佛披着[图五]。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数件斗篷，多为黄片金织做，体量宽大，如〔图七〕，开身，立领口，领襟镶明黄缎绣缠枝纹，莲蕾中绣黑色兰札体梵文咒。缘黑色海龙皮边，红素缎里，内絮薄棉。背部领下正中位置镶饰方形石青色花卉织金缎一块[2]。此件斗篷织造于乾隆时期，无论是用于穿披还是供奉，均为做工精良、用料讲究之上品。

（二）菩萨衣饰

菩萨造像除了身着包裹式佛衣外，还有长坎肩式佛衣、分体织金缎佛衣及璎珞衣。

‹1›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佛日楼、梵华楼》，设402。

‹2› 前揭张琼主编《清代宫廷服饰》，第240页。

〔图九〕长坎肩式佛衣组合



〔图十〕分体织金缎佛衣



1. 长坎肩式佛衣

这尊铜观音菩萨像，身着红色织金缎敞口坎肩〔图八〕，长及脚面，圆领无袖，随身形做出束腰，颈部系珍珠钮扣一个，整个衣边通镶石青、白色五层牙子，简单明快。

另一组释迦牟尼和八大菩萨组合像，释迦佛身披织金缎斗篷，八尊菩萨腰系红织金缎长裙，外着喇叭形长坎肩〔图九〕，正中束腰处镶铜镀金花形钮扣，装饰性极强。坎肩领口处系珍珠钮扣，坎肩外再披如意云肩。这是一组西藏制作的仿古像，佛衣为清宫配做，因长年供奉，佛衣呈烟熏色且残破多处。

〔图十一〕分体织锦佛衣



2. 分体织金缎佛衣

此种佛衣即上为云肩、下为长裙的佛衣形式。云肩一般为四边形，中间开圆领口，领口缀松石或珊瑚扣，四角绣如意云头，肩部前后绣饰八宝或花卉图案〔图十〕。分体佛衣不仅用于菩萨像，也多见于菩萨装的佛像，清宫最常见的则是无量寿佛身着分体佛衣的情况，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考究，成为清代宫廷佛衣的典型代表。

〔图十一〕为无量寿佛立像，肩披黄绿双色金边三角云肩，下身着双层裙，里层短裙至膝部，外层长裙长至脚踝。内外长裙均紧贴双腿，裙面上阴线刻大花枝图案，并错嵌金银丝。清宫廷所系黄纸签云：“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另进扎什琍玛无量寿佛一尊。共五尊。”这是当时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进贡的五尊铜造像之一。此佛衣为清宫旧配，是佛像进宫后奉旨装饰的。为使佛衣穿戴方便，有的云肩做成两片独立的三角形，前后各披一片，两片在佛

〔图十二〕四臂成锁观音璎珞衣



像肩部用绳绑系。此为一例。

乾隆时期的分体织金缎佛衣典雅大方，体现了皇家佛衣尊贵但不张扬的特点。乾隆皇帝对此种佛衣样式颇为偏爱，多次制作供奉，尤其是他喜爱的紫金琍玛在宫中试验成功后，均为之配置了这种佛衣，并多次将紫金琍玛像及其佛衣作为礼品赏赐给西藏的班禅和达赖。档案载：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命造办处新造紫金琍玛无量寿佛九尊，配铜镀金背光及佛衣，得时给藏安供”[1]。于五十六年五月十七日，“将造得紫金琍玛无量寿佛九尊随铜底金背光座，配得片金佛衣，交太监厄鲁里呈览，奉旨俟年班藏里来京之喇嘛官员等到京时，将佛配木箱盛装，塞垫包裹妥，交随来照看之员赏去供佛，仍于造办处派裁缝二名随去。钦此。”[2]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九尊紫金无量寿佛，随精美雅致的佛衣一起送至西藏，作为皇帝赏赐的珍贵礼品永远留在了雪域高原。

除了赏赐外，乾隆帝更喜欢将佛衣供奉在自己的专用佛堂里。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三十日，乾隆皇帝下旨将北海万佛楼现供的九尊紫金琍玛无量寿佛请进宫来，安供在宁寿宫养性殿东配殿，并吩咐配做新佛衣，镶镀金排扣，安松石钮子[3]。在乾隆皇帝看来，佛衣是一件宫廷佛像完整呈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缨络衣

此类佛衣是佛衣中最为独特的类型，常用象牙、黄金、宝石等名贵材料做装饰，是宫廷佛衣中最繁复奢华的一种类型，也是最能体现清宫佛衣特点的一种样式。

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几件菩萨璎珞衣，与清宫档案几乎能够完全对应，例如现供奉于养性殿西暖阁佛堂内的四臂成锁观音〔图十二〕，是一尊来自西藏的造像，其黄色刺绣佛衣为清宫配做，佛衣外罩白扣珠及红蓝宝石坠角网状璎珞，领口系红珊瑚钮子，方形云肩，裙身满绣缠枝花纹及吉祥八宝纹，裙下摆绣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后文简称《总汇》）第52册，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

‹2› 前揭《总汇》第52册，第248页。

‹3› 前揭《总汇》第55册，第363页。

饰海水山石图案。胸前和裙上的珠串装饰最为复杂，但繁而不乱。佛衣设色丰富，纹饰构图饱满，将黄金、米珠、宝石与刺绣等技艺完美结合。这尊像于乾隆三十七年四月由西藏扎什伦布寺进献而来，进入宫廷后，乾隆首先令造办处为其配做紫檀木龛及佛衣，并要求发往苏州用头等顾绣技法成做，佛衣上的璎珞、金活则后期由造办处来完成‹1›。先后历时八月余，龛和佛衣才全部完工。

另有一件是现供奉于雨花阁一层东间的白檀香水月观音〔图十三〕，高122.5厘米，乾隆十七年由西藏布达拉宫制造并进献入宫。乾隆帝对此像十分青睐，曾反复仿造雕作。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当粤海关将一批白檀香木送进宫时，乾隆帝让太监挑选最长的白檀香木一段，照中正殿雨花阁下东间现供水月观音一样新做一尊，还要求背光、底座及佛衣样式均与雨花阁水月观音一模一样，同时还指出雨花阁水月观音的裙子偏窄，新做时要将裙子放宽大些，最后还不忘指出雨花阁水月观音现穿佛衣云肩不舒展，要往平整里收拾‹2›。

之后雨花阁水月观音的旧佛衣连同新佛衣纸样，被一同交苏州绣做两份：一份用于雨花阁现供水月观音换穿，另一份用于新做观音，两件均做成黄缎地绣五彩八宝云背佛衣。一月之后，粤海关又送到大檀香整木一段，乾隆帝急忙命造办处再造观音一尊，同时传与苏州织造舒文，照现正做水月观音绣佛衣一样再绣做佛衣一份，佛衣上砗磲、璎珞、珐琅牌子等装饰在京内后期配做‹3›。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三件佛衣送至宫中。

直至今日，雨花阁一层水月观音仍完好矗立于原地，其佛衣上的五彩海水、海兽纹样清晰完整，外饰象牙板及圆珠璎珞精巧别致，连续规范，佛衣与造像浑然一体，宛若天成。

还有一些璎珞衣并未穿在菩萨身上，而是供奉在佛堂供器箱内，其中亦不乏精美之作，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清宫六品佛楼供奉的五色璎珞衣‹4›，即白、蓝、黄、红、绿五种颜色璎珞佛衣，五种颜色代表五方佛。这些璎珞衣均来自苏州，花纹端庄大气，绣工精致细腻，以五色素缎地绣图案，具有清代宫廷刺绣的工艺特点。〔图十四〕这件白色璎珞衣在白色素缎地上用五彩丝线绣祥云、红蝠、八宝和海水江崖纹；外罩白色象牙珠网状璎珞，牙板上雕刻有空行母与四大天王等藏密诸神，璎珞垂吊明黄丝线穗及铜镀金铃，裙缘饰石青色织金缎边；云肩四角绣如意云头，间饰八宝纹，中间开圆领口，缀松石扣，外罩象牙璎珞；胸前一角垂饰绣如意云头及五彩绣释迦牟尼像。目前故宫博物院唯一保存完好的六品佛楼梵华楼法器箱内存放了绣五彩象牙璎珞衣五份，此即其中之一‹5›。

‹1› 前揭《总汇》第35册，第112页。

‹2› 前揭《总汇》第40册，第455－457页。

‹3› 前揭《总汇》第40册，第457－46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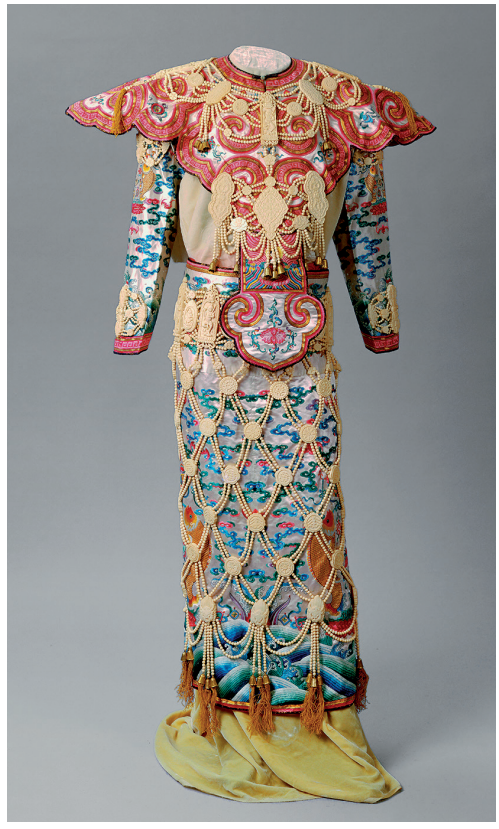
‹4› 按照藏传佛教格鲁派密宗修行的四个层次，即事部、行部、瑜伽部（分父续、母续）、无上瑜伽部，加上显宗的般若部，共称六品，六品佛楼即是按照此六品内容分别供奉相应的佛像、佛经、法器及佛塔的建筑。档案中也将其称为“妙吉祥大宝楼”。六品代表藏传佛教修行的六个部分。

‹5› 罗文华《龙袍与袈裟》（上），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图十三〕雨花阁水月观音珊珞衣



〔图十四〕白色缎象牙璎珞衣



据档案统计，乾隆时期先后制作的五色璎珞衣共17套之多，均由苏州奉旨制作，分别供奉在雍和宫以及慧曜楼、梵香楼、众香楼、淡远楼等各处六品佛楼[1]。可见，成套的五色璎珞衣是专门为清宫六品佛楼定制的供奉佛衣。

（三）本尊及忿怒尊神衣饰

大威德金刚、上乐金刚、降阎魔尊等本尊神及忿怒尊护法神，一般身着虎皮或象皮衣，在宫廷佛堂中，目前仅见虎皮衣。这些尊像有的仅腰部系虎皮裙，有的上身还披素缎绣花云肩。这里所说的虎皮或是在素白绫上绘出的虎纹彩色图案，或是在黄色倭缎上烙出的虎纹图案。亦有本尊神上身赤裸，胸前配挂人头骨项链，腰系虎皮裙，形象夸张，充满力量。有的忿怒尊神与明妃各穿一套佛衣，即上身云肩，腰穿虎皮裙；也有的本尊与明妃共着一条虎皮裙。虎皮佛衣做得十分逼真，不但做出老虎的眼睛和鼻子等五官，还做出了虎爪和胡须〔图十五，图十六〕。

（四）仪轨用衣

仪轨用衣是专门为宫廷僧人所制作的一种特殊佛衣，又称法衣、喇嘛衣，供宫廷佛教高僧在各种重

‹1› 文明《造办处〈活计档〉所见乾隆时期苏州织造制作呈进佛教器物考》，《故宫里的江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9页。

〔图十五〕虎皮佛衣



〔图十六〕虎皮佛衣



大法事活动时所穿用，常见有璎珞衣、千佛衣、五衣、七衣、坎肩、披衫、裙等多种样式‹1›，〔图十七〕为一件绛色织金缎夹喇嘛衣，衣长150厘米，两袖通长190厘米，下幅宽155厘米，云龙暗花缎面，棱形云肩，裙口和腰部饰五彩云龙织金缎，各加明黄片金边两条。清代紫禁城中正殿每年新年都要举行“跳步扎”活动，这件喇嘛衣是宫中为此类宗教仪式中的喇嘛舞者所制作的法衣‹2›。此套法衣共10件，用料华贵、做工精细，是清早期珍贵的织绣精品。

二　清宫佛衣的来源和制作机构

由于时间久远，清宫制作和收藏的佛衣，有的已经糟朽残破，有的与佛像分离，大多都已不存，现保存下来数量最多的是乾隆时期的佛衣。分析故宫博物院现存佛衣的来源，基本可分为造办处制作、江南苏州织造承造及藏地进献三类。前两种均由养心殿造办处管理，风格相似，带有浓郁的皇家宫廷特色，藏地佛衣通常由宗教领袖随佛像一起进献而来，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

‹1›　前揭《总汇》第27册，第515—517页。

‹2›　前揭张琼主编《清代宫廷服饰》，第243页。

〔图十七〕清康熙绛色织金缎夹喇嘛衣



养心殿造办处是专门服务于皇帝的内廷造办机构，也是宫廷负责佛衣制作的管理机构，在《造办处活计档》中，皮裁作、匣作、木作、镀金作、铸炉处、珐琅作和杂活作等几乎每一作都有制作佛衣的记录，并不是固定在某一处，也就是说，造办处各作坊基本都承担了宫中佛衣的制作及加工，与此同时，宫廷外送来的佛衣，其后期装饰部分如钮扣、璎珞及各种金活等配做工作，一般也由宫中造办处工匠完成。

江南三织造是内务府中负责织造宫廷及官用绸缎等纺织品的机构，佛衣主要由苏州织造处负责制作，其所用材料、花样、颜色、工艺、数目等均依照皇帝的意见拟定，先抹样呈览，抹样通过后再交由苏州织造处办理，绣织完成后解送回宫中，由织造官挑选后将所收佛衣数目及质量情况呈奏，最后移交户部销算费用。

宫廷佛堂佛像穿配的佛衣绝大多数由苏州织造处完成，尤其是皇帝专用佛堂所供佛衣、年节更换的佛衣、宫廷赏赐所用佛衣，以及为皇帝钟爱的佛像配做的佛衣等，都由苏州织造奉旨来完成。这些佛衣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极高，一般由当地最优秀的匠人制作，有时皇帝还会派人监视佛衣的整个织做过程。

另外，圆明园天地一家春也是宫廷制作佛衣的地方，隶属造办处，但这里规模小，仅仅制作或加工一些普通佛衣或小活计，而对那些工艺复杂的佛衣，宫里仍发往苏州专业织办。

三　清宫佛衣的特点

1. 样式丰富、纹样复杂多变

乾隆时期，宫廷佛衣织造进入高峰，大量的佛衣被源源不断织造出来，以满足新旧寺庙供奉的需要。由于佛衣的需求量急增，宫内造办处各作坊及苏州织造都在源源不断地织做佛衣供皇家佛堂使用，不仅数量多，而且样式十分丰富，经笔者统计，有片金佛衣、锦边片金佛衣、绸缎佛衣、红片金佛衣、黄片金斗篷璎珞云肩佛衣、红洋锦佛衣、亮花缎佛衣、皮佛衣、洋花缎佛衣、画黄缎佛衣、金银缎佛衣、五色缨络佛衣、红黄片金镶皮边佛衣、冬季佛衣、夏季佛衣、海龙皮边佛衣、纱佛衣、倭缎画虎皮佛衣、象皮佛衣等多达40多种样式。

2. 制作精良、不惜工本

乾隆时期国力强盛，同宫廷其他御用品一样，这时的佛衣制作也同样追求奢华，工艺上精益求精，

装饰上苛求细节，不计成本，用料极其珍贵，仅佛衣钮扣就有金以及珊瑚、珍珠、青金石、红宝石和绿松石等多种名贵珠宝。在最具清宫特色的璎珞衣上，几乎每件都嵌满珍珠、宝石、象牙、砗磲、青金石等珍宝，在满足佛衣基本功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体现皇家御用品独特的艺术魅力。

3. 制作和改做数量巨大

乾隆时期佛衣制作频率之高、数量之大为清代各朝之首，一次制作或改做几十件、上百件佛衣的情况很常见，这一点在京城重要的皇家寺院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阐福寺一次制作佛衣400件、雍和宫曾一次改做佛衣240件、恩慕寺一次新做112件、圆明园新做108件等。在这些需要大量佛衣的地方，造办处也会使用宫内贮存的旧佛衣凑齐数量，并不是全部新做。

4. 宫廷佛堂供奉佛衣

除了大量的穿戴佛衣，清宫佛衣的另一大特色则是装匣供奉，可称之为供奉佛衣。供奉佛衣分两种，一种是将做好的佛衣盛装在鞔皮画金匣内，供放于佛堂备用，每逢年节或皇帝前来拜佛时临时穿供；另一种则是仅用于供奉，同样盛放于鞔皮画金箱内，不穿也不示人，常与各种法器一起同放一箱，陈放于佛堂供柜里。有时在一个佛堂里可见两种供奉佛衣分置两箱，同时敬奉，分工明确不混淆。

四　结语

佛衣既是诸佛的衣饰，是使佛像更加宝相庄严的加持，又是表达对佛教三宝崇敬的礼敬类法器，是佛教的圣物。清代宫廷佛衣作为佛教重要的法器类型之一，首先是用于皇家信仰和修行活动，它不仅表达了皇室贵族的虔诚与执着，还包含了祈获福祉的寓意；其次它更是艺术品，其丰富的样式、多变的色彩、精湛的绣工、庄严的气派，是观察和研究宫廷宗教艺术特点的重要视角。

另一方面，清宫佛衣是中央政府与西藏等地宗教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清朝各个时期，朝廷中央每年都会依制向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赏赐礼品，以示皇恩，在这些赏赐礼单中，佛衣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用作赏赐的佛衣，大多由苏州绣做，代表了清代织绣工艺的最高成就，在汉藏两地佛教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藏地宗教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汉藏关系进一步密切，一批又一批的藏传佛教僧人到内地朝觐或弘法，将具有鲜明藏民族宗教和文化特色的佛教艺术品带入内地，使两地宗教艺术达到全方位融合，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佛衣就是见证和延续这一历史交流的重要载体，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

（责任编辑：何　芳）